

2012 中国思想类图书关键词

□ 王行坤 倪 明

2012 年对中国来说，是继往开来的一年。很多学者对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自觉的总结与反思。另外，思想界对科学知识问题也做出了回应——尤其是正在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本文拟就一些关键词的梳理，来回顾过去一年我国思想界和出版界的主要成果。

儒学、现代与社会主义

战后日本经济迅猛发展，后来的东亚“四小龙”也创造了高发展记录。以森岛通夫为代表的东亚思想家，开始质疑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所确立的必然关系，认为这些发生“日本奇迹”与“东亚奇迹”的经济体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因此儒家文明与现代性或者资本主义并不是那么杳然而隔离。森岛认为英国是新教资本主义典型，而日本是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于是，作为“游魂”的儒学又可以借尸还魂，西方人也开始愿意去认真对待儒家文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儒家资本主义论以及由此而引申开来的各种相关论说也在中国思想界蔓延开来。

甘阳可以说是这种思想取向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代表，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其是否受到森岛论说的影响。2012 年初所出版的《文明 国家 大学》可以说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总结。虽是一个论文集，但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思想“事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本新书出版不久，便在北大举行了研讨会，张祥龙、唐文明、白钢、欧树军、杨立华、黄平等学者进行了深入点评。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中国道路，第二次思想解放，大学。在中国 GDP 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语境下，中国应该有这种自觉，去重新认识自己的道路。对此，甘阳有充分的自觉：“我认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打破西方 500 年来对全球的统治，而只有中国民族具有这种可能性，别的民族——如印度之类——都没有可能性。这就是做中国人的真正意义所在，我们需要朝向这个目标而奋斗。”于是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从富强到博雅，通三统（孔子、毛泽东以及邓小平的传统），以及儒家作为最高宪政等问题，都成为甘阳关注的核心，也是我们应该面对的时代问题。

2012年是姚中秋（秋风）的丰收之年，一共出版了五部著作：《天下》《封建》（这是“华夏治理秩序史”的前两卷，计划共五卷）《寻找中道》《美德·君子·风俗》以及《重新发现儒家》。从书名可以看出，这几本著作都是对儒家的再发现。因为篇幅，我们着重介绍《重新发现儒家》这本著作。这本书是“华夏治理秩序”系列的副产品，从中也可以管窥作者的总体思路与想法。在作者看来，认识中国历史的关键就在于重新认识儒家。通过对儒家的辩诬，作者不仅意在揭示儒家有利于世道人心的心性教养功能，同时也着意去发掘儒家有利于政道秩序的治理作用，从而澄清激进的反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儒家的诸多曲解与误读。因此，儒家与“人治”“三纲”“变革”以及“市场”的关系，宗族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儒家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就构成了本书的主体。

唐文明今年出版了两本专著：《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以及《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前一本太过学术化，我们且谈谈后一本。《敷教在宽》主要考察的是青年康有为——即写作《教学通义》时（1886年前后）的康有为——的孔教思想。“敷教在宽”语出《尚书·舜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我们且不论那时有没有“五品”“五教”等称谓，康有为的写作本非经学性或学术性的，而是思想性和政治性的。唐文明的解读也正是为了挖掘其中的思想性与政治性，

尤其是其中的孔教论。1913年的这段话更好地说明康设孔教的意图：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礼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极。唐文明或许在当下中国也感到同样的问题。康有为不只注意到儒教与中国在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关联，更注意到二者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关联。在康看来，儒教是中国的特有的国性，没有了儒家，国家将亡，民族也无从谈起。这也是唐认为，没有儒教，就没有传统中国的原因所在。唐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在于以教化为政治，这正是康有为和唐自己所向往的政道。文化与政治变得融通起来，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可以合二为一，如此便可以用文教—国家去补充政党—国家在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中存在的缺位与不足。

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蔓延，以西方话语为代表的普世话语遭到质疑，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重新发现儒家就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趋势。但这些潮流普遍忽视了中国传统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儒法传统的张力以及儒家与社会主义的扞格，关于这一点请参考我俩的《儒法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未来》（《文化纵横》，2012年第6期）。

科技、自然与人文

20世纪50年代，斯诺（C. P. Snow）和利维斯（F. R. Leavis）进行了“两种

文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争论。这种争论并非空穴来风，其实在19世纪80年代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与马修·阿诺德之间就进行了一场类似的争论。可以说，从15世纪开始到20世纪后期，争论就没有平息过。科技与人文的分离，可以说是现代性所引发的诸神之争的必然结果。

以科学元堪（Science Studies）学者哈拉维（Donna Haraway）为代表的后人本主义科学家旨在打破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文（文化）、科技与人文等二元对立。这本《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的副标题就是“自然的再造”。在哈拉维看来，并不存在本源的第一自然，也没有原初的人性（human nature）。这种二元对立是支配原则的结果（principle of domination）。这种原则深刻地内嵌在我们的自然科学中，尤其是那些旨在解释社会群体和行为的学科。如果人文学者回避当代科学理论与实践中所存在的支配原则，那就不可能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和内容进行关键且艰难的审视。

科学家在发现自然界秘密的时候，必然是抱着改变自然界的目。发现自然的过程也就是制造自然的过程，而在这种制造或者建构的背后必然存在着支配原则。这种支配原则最根本的就体现在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中。

但哈拉维告诉我们，这种对立从不曾存在过，我们从未现代过！自然与文化、科学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不再有效，我们应该去迎接自然的终结。尤其是当科学涉及人的自然时，生物技术让人的

自然彻底成为神话，自然的人不再存在，因为我们都是赛博格。

赛博格（cyborg）由控制论（cybernetic）和有机体（organism）组成，原意是受控机体，最早由美国航天和航空局的两个科学家在1960年提出，指的是依靠辅助器械，从而让自身机能得到增强的有机体。赛博格打破了人与动物、有机体（人和动物）与机器以及自然与非自然之间的界限。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番茄可以带有深海鲑鱼的基因，物种之间、甚至植物与动物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哈拉维指出，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到默茜特（Merchant）的《自然之死》，这些进步思想家都认识到技术的支配意志，于是他们都诉诸想象的有机体，来进行反抗。但在哈拉维看来，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必须走出现代性的神话，从整体的视角对自然与社会、科学与人文进行研究。

对于面临产业转型的中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个热点话题。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译本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里夫金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相比于需要动用国家机器进行集中式管理的“精英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太阳能和风能在本质上是亲民主的，因为它们可以随地获取。一旦可再生能源和互联网技术整合起来，将会形成一种分散合作式的组织模式，与前两次工业革命所伴生的“集中式”组织模式迥然不同。而第三次

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和生产企业的主流也将不再是那种集权式的大型托拉斯，而是小型、分散和相互协作的生产单位。人与人的关系将由竞争的买卖关系变为相互合作、共享的伙伴关系，生态网络将取代买卖市场而成为未来经济活动的场域。里夫金把这种新社会命名为“分布式资本主义”，以区别于目前的“集中式资本主义”。里夫金对新社会的畅想，应该说很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无疑对我们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提起工业革命，自然也不能不提到科学革命。19世纪之后，科学已经成为了工业的最主要的助推剂，并成为西方文明自我确证的第一手段。但关于科学革命的实质和起源，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H·F·科恩在《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对科学史界关于科学革命的各种论说作了详尽透彻的梳理。科恩为我们展示了科学革命的思想、宗教、文化和社会背景，其中就包括古希腊科学、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科学仪器的应用、科学社团的兴起，以及新教伦理等各种内外因子。因此，西方科学不仅是一系列科学定律的集合，而且是关联着整个西方大传统。科恩此书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科学为何在西方产生，也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史界对科学何以未在近代西欧以外产生的各种讨论，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何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科恩对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做了较大篇幅的讨论，澄清和梳理了散落在李约瑟各种文本中的观点，同时也全面展现了李约瑟所遭

到的各种批评。相信这部分的内容对于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颇有助益。

中国、美国与世界

张维为《中国触动》这本书其实是2008年《中国触动全球》的修订版，之所以将其列在这里，是因为前者与2011年出版的《中国震撼》形成了一个整体，意在总结并反思中国这30年来的社会发展历程和经济增长模式，并试图用中国自己的话语来进行言说。

作者既作为邓小平的翻译参与国事访问，也以学者身份走访了全球100多个国家与地区，这就让作者的研究具有了很强的在地性和说服力。作者切身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坏。如此贬低中国模式的那些人，他们的眼中只有西欧和美国（也许只有美国），除此之外，他们既不了解，也不关心。作者通过比较研究指出，美国式的政治体制并不一定会带来预期效果，中国作为超级人口大国，必须且只能去探索自身的发展之路。而通过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奇迹”所昭示的中国道路是良善的、可持续的。

当然，作者并非一味在唱赞歌，也指出了一些严峻的问题，如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以及生态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中国道路也可能会越走越窄。

美国前国务卿、政坛常青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的《论中

国》在中西都引起了不小反响。英国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就此做了评述。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作者记录了自己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同时作为学者，作者也试图从“中国的独特性”去理解这个国家。第一次启程来会见周恩来的时候，基辛格对中国尚一无所知，于是他找到了费正清和拉铁摩尔——两位中国研究权威——希望他们可以给他开几门速成课。

从书中可以看出，基辛格学得很好，尤其在前三章的历史论述，为毛泽东的革命铺设了理解的前提。随后就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作者对毛的革命实践也给予了一定的理解之同情，并始终认为毛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书中详述了中美建交的诸多细节，让我们对当时的战略局势以及决策者的思路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基辛格指出中美存在两种不同的例外主义——美国是传经布道式的，要全世界都美国化，而中国却是文化性的，强调“道并行而不相悖”，面对中国崛起，中美不应该重蹈当年德英的覆辙，不应该“零和博弈”，而应该“共同进化”，“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至于这如何可能，我们且静观其变。

资本、危机与未来的秩序

《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是根据王绍光在北大通识教育讲习班的讲稿整理而成的。作者提及他早在1984年就把《大转型》这本书带到国内，但是没有人感兴趣，因为这本书与

中国没有相关性，没什么出版价值。我们知道，直到2007年这本书在国内才有中文本。这时，波兰尼所说的“市场社会”（表现为对自发调节市场的迷信）所导致的一系列危机——贫富分化、道德危机、生态危机——已全面爆发。经济完全脱嵌，不再受到政治、社会或道德的制约。尤其在中国，劳动力与自然作为虚拟商品，更是受到了滥用。

当然，这也是有其过程的。作者将中国的转型分为了几个阶段：1949—1984年的伦理经济阶段，靠计划经济来安排生活，虽然贫困，但是各个方面发展也还不错；从改革开放到80年代中期，中国慢慢从伦理经济转向市场社会，效率优先，GDP优先成为基本政策，其结果就是不平等的出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崩溃，以及人与人之间信任缺失等问题；1990年代，市场经济开始侵入了非市场领域，伦理经济彻底崩溃，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加剧，矛盾更加激化。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作者也指出，根据波兰尼的理论以及当下中国的发展趋势，社会出现了强大的“反向运动”，中国正在逐渐地从“市场社会退出，向社会市场迈进”。

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最初作为关于世界经济的特别报告发表于《新左派评论》1998年5至6月号，后经增减和修改成书。亨里克·格罗斯曼在出版《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崩溃：危机理论》几个月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就爆发了1929—1933年经济危机；而《全球动荡的经济学》作为专著出版

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在 2008 年发生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过去。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存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布伦纳借鉴了这一观点，认为西方社会自 1973 年以后的经济衰退，其原因就在于日益增长的竞争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当前的全球性衰退不仅仅是金融危机，而且也是 1973 年以后长期衰退的资本主义更深层危机的表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过剩。作者对以日本、德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可以说是《五百年来谁著史》的续篇。在这本书中，作者溯源而上，从马克思的知识活动写到中国以及当下的金融危机，梳理了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卢梭、康德、尼采、列宁、毛泽东以及美国等的关系。作者并非学术式地去做“马克思学”的研究，而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去探究马克思事业的前景与可能。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不仅为全球生产出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也产生了 3 亿多的农民工，而这些农民工的生存境遇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资本有着内在关联。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下，才能理解中国农民工的现实与潜能。离开马克思，这种理解将不再可能。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今天中国再次迎来了阅读马克思的历史时刻。

作者通过对《资本论》第三卷的细读，发现了一个另外的马克思：一个作为时代先知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不只

关注现实的物质生产，而是更加关注社会再生产。前者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生产，后者则是投资—放贷制度和信用制度。在作者看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区别就在于，恩格斯只关注企业内部的物质生产，即实体经济的生产，这种生产就是他这样的企业家所从事的；而马克思关注的则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这种虚拟资本正是控制现实资本的幕后黑手，而从事这一行业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资本家。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就在于社会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矛盾，即现实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于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质就不是布伦纳所说的生产过剩，而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是美国信用破产所引发的。美国长期以来通过垄断国际信用，大规模发行债务，以债务和虚拟资本驱动世界经济，这条道路已经走向了破产。

作者用全球资本主义以及不平衡发展的视角去看待毛泽东的现代中国革命，同时作者也反省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呼吁一种新的知识人。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启发我们从金融和信用的角度去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中、美国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我们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崛起的真正意义，中国国家能力的建设，去认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作者单位：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
(责任编辑 洪滔)